赞比亚政教关系的历史透视

----基干殖民当局与传教会通信的考察

刘伟才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摘 要: 赞比亚的政教关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起开始复杂化,教会力量日渐上升,政府愈显局促。欲明了赞比亚的这种态势,需透视其政教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白衣神父会为赞比亚主要教会力量之一,在殖民地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借助在群众基础和思想观念影响方面的特殊优势,白衣神父会一方面服从殖民当局管理并配合当局工作,另一方面也与当局明争暗斗。这种当局与教会间的关系模式一直伴随赞比亚的发展,当赞比亚政府缺陷日益凸显时,教会的影响逐渐增加,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关键词: 赞比亚; 政教关系: 白衣神父会; 北罗得西亚

20 世纪 80 年代,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赞比亚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卡翁达(Kenneth Kaunda)自 1964 年以来的长期统治受到质疑和攻击。经过斗争,赞比亚的教会力量联合其他力量于 1991 年结束了卡翁达统治。继卡翁达上台的奇卢巴(Frederick Chiluba) 在第二届任期行将结束时意欲修改宪法以谋求第三任期,这招来教会力量的反对。以教会为核心和领导的派别组成 "绿洲论坛"(Oasis Forum) 进行阻止,使奇卢巴谋求第三任期的努力归于失败。 "绿洲论坛"因反对奇卢巴谋求第三任期而形成,此后持续介入赞比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领域。

赞比亚在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称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它由 1891 年成立的西北罗得西亚(North Western Rhodesia)和东北罗得西亚(North Eastern Rhodesia)在1910 年合并而成。北罗得西亚初由享有特许权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管辖(1910 年前西北罗得西亚和东北罗得西亚各有行政当局,但同受公司节制),后转由英国政府派设以总督为首的当局掌控。在北罗得西亚之前,在今天赞比亚这块土地上,西部有独立的洛兹人(Lozi)王国,东部由好战的奔巴人(Bemba)、恩戈尼人(Ngoni)以及来自非洲东海岸的掠奴者居主导地位,北部主要是与刚果河流域的隆达国家(Lunda)有联系的卡曾伯王国(Kazembe),南部主要居民是通加人(Tonga)、伊拉人(Ila)。此时,并不存在现代赞比亚意义上的统一疆域。正是在此期间传教士从多个方向进入,逐步确立其存在。传教力量很快卷入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它们以"拯救非洲人"为己任,不遗余力地传播甚至强制传播西方文明,为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为殖民地诞生后的维持和管理做了很多工作,一些传教站更是成为所在地区的拥权者。随着殖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传教力量的影响和控制有所削弱,但仍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其对非洲人的精神影响更是无法抹杀,成为殖民当局或需借助或不得不考虑的客观现实。

收稿日期: 2015-12-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 《非洲经济史》" (14ZDB063) 和上海市高原学科上海

师范大学世界史建设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伟才,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非洲史。

关于赞比亚的政教关系,国内尚无人涉足,而国外已有一定研究。安德鲁•罗伯特斯(Andrew Roberts)在《赞比亚史》一书中提出,赞比亚的殖民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而起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各路传教力量的开拓;①列维斯•加恩(Lewis H. Gann)在《一个多元社会的诞生:英国南非公司治下的北罗得西亚的发展(1894-1914)》一书中提出,殖民时期的赞比亚是一个多元社会,这个多元社会由四种因素构成,除了非洲人、殖民当局、白人移民外,再就是传教士;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Rotberg)的《基督传教士与北罗得西亚的创建》一书则以书题直接指明了传教士的作用,他认为传教士是北罗得西亚的创建者之一,是赞比亚殖民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推行者,而传教站则更是培养非洲民族主义领导者的温床。②还有一些研究关注赞比亚政教关系晚近的发展情况,如皮里(Isaac Phiri)的《为什么教会要宣讲政治:以赞比亚为例》对赞比亚教会力量以布道形式宣讲政治的现象进行了研究;③而一家非政府组织则有题为《教会对赞比亚发展的贡献》的研究报告,对教会在赞比亚民主建设。"良政促进"、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贡献进行了阐述。④本文以"白衣神父会"(White Fathers)为个案,选用白衣神父会与北罗得西亚殖民当局在1898-1918 年间的部分通信⑤为基础展开研究,力图还原赞比亚殖民时代政府与教会之间互动的情势,并总结相应的政教关系模式,探讨其对赞比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影响。

一、白衣神父会进入北罗得西亚

最先进入北罗得西亚的传教者是著名的非洲内陆探险者、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57 年,利文斯顿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称自己正在努力为基督教开辟道路,希望后来者继续其工作。这次演讲直接促成了由英国国教会支持的中非大学传教团(Universities' Mission to Central Africa)的成立。同时,一些苏格兰、英格兰和法国的传教团体也明确表达了要在非洲的部落地区传教的愿望并很快开始付诸实际行动。

1874 年,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宣布建立一个以利文斯顿为名的传教团——利文斯顿尼亚传教团(Livingstonia Mission),将向北罗得西亚及周边地区传播福音。1878 – 1881 年,先后有多名传教士进入北罗得西亚或在周边进行探查。从 1882 年开始,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巴黎传教会(Paris Missionary Society)、白衣神父会、原始偱道会(Primitive Methodists)、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基督复临安息日会(The Seventh – day Adventists)、卫理公会(Wesleyan Methodists)等先后在北罗得西亚建立传教站。此外,一些在周边建立的传教站也对北罗得西亚产生影响,它们成为传教力量进入北罗得西亚的基地。到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在北罗得西亚的传教站已达 53 个,基本形成了对北罗得西亚全境的覆盖。⑥

白衣神父会创立于 1868 年,创立者名夏尔·拉维热里(Charles Martial Lavigerie),曾为阿尔及尔大主教(Archbishop of Algiers)。白衣神父会成立之初,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同定为传教对象,立

① Andrew Roberts , A History of Zambia , London: Heinemann , 1976 , pp. 149 – 172.

② Robert I. Rotberg ,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Northern Rhodesia 1880 – 1924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p. vii.

³ Isaac Phiri, "Why African Churches Preach Politics: The Case of Zambia,"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4, No. 2 (Spring 1999).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Group , The Church'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in Zambia: A Research Report , Lusaka: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Group , 2000.

⑤ 这批通信档案资料藏于白衣神父会下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赞比亚信仰面对面中心"(FENZA, Faith and Encounter Center Zambia) 的档案馆。下文注明引用档案资料时,"FENZA Archives"表示引用资料出自"赞比亚信仰面对面中心"档案馆,"ZWF"开头的编号为档案编号。

⁶ Robert I. Rotberg,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Northern Rhodesia 1880 - 1924, pp. 72 - 73.

志使其接受并信奉基督教,但在对阿拉伯人传教过程中遭遇挫折后,白衣神父会将力量主要集中在非洲人身上。1878年,白衣神父会开始在东非传教,随后逐渐渗入北罗得西亚东北部高原地区。1895年,白衣神父会在靠近奔巴人聚居区的卡亚姆比(Kayambi)建立传教站。1897年,白衣神父会的杜邦主教(Bishop Dupont)访问奔巴人最有威势的酋长之一姆旺巴(Mwamba),提出要在其领地建立传教站,但遭姆旺巴拒绝。当时姆旺巴正受病痛折磨,于是杜邦主教一面尽力医治姆旺巴,一面不断通过分送礼品而与其他重要人物拉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当地事务。姆旺巴死后,杜邦主教声称姆旺巴将其认作继承人。尽管这一说法是可疑的,但在姆旺巴死后的一段时期里,杜邦主教确实担起了一些安抚和管理族群的责任。

对于杜邦主教的诉求,英国南非公司表示质疑。而杜邦主教在面对白人当局时,也承认了他只是想在奔巴人地区建立传教站,并表示愿意竭诚为公司服务。当时,英国南非公司并不愿意让具有法国和天主教双重背景的白衣神父会在东北罗得西亚立足。但是,白衣神父会在东北罗得西亚的影响已是既成事实,而且由于资金、人力等方面的限制,当局当时还并不能真正在当地行使权力。综合起来考虑,让白衣神父会在"蛮荒之地"凸显欧洲殖民存在并发挥欧洲文明影响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局遂致信杜邦主教,同意其在姆旺巴村庄附近建立传教站。

在这份许可信中,当局授权白衣神父会可在奇卢布拉(Chilubula,位于今赞比亚东北部)建立传教站,传教站可掌管传教站本身及周边不大于 10 平方英里地区的事务,可管理所辖范围内黑人居民的司法事务,并任命两名黑人协助管理事务。但同时,当局明确规定,具体管理范围由当局的地区征税官决定,协助管理事务的黑人的任命也需要得到地区征税官的认可。此外,当局也明确规定传教站无权拘禁黑人,无权执行重于鞭打的刑罚,无权收取 10 先令以上的罚款,所有较为严重的处罚都应与地区征税官协商;而在传教方面,当局则明确规定,不得向接近穆斯林的区域传教,不得与伦敦传教会发生冲突。①

此后,白衣神父会在北罗得西亚的传教事业稳步推进。在 1899 年获得当局许可后,"白衣神父会"迅速在奇卢巴拉和奇隆加(Chilonga)建立传教站。鉴于当时在北罗得西亚活动的传教集团众多,竞争激烈,"白衣神父会"将主要力量投放于自己立足稳固的东北部和东部。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时,白衣神父会的传教站已基本覆盖今赞比亚的北部省(Northern Province)和卢安瓜省(Luangwa Province),并在东部省立足,逼近赞比亚中南部地区,成为北罗得西亚主要传教会之一。

二、白衣神父会对当局的服从和配合

在西北罗得西亚和东北罗得西亚两地中,前者因早有白人进入,且当地的洛兹人愿意与白人发展关系,因此公司在当地的存在较易确立。而后者则既缺少白人的持续存在和影响,又存在当地奔巴人和奴隶贩子的不驯服,因此英国南非公司在一段时期里并不能在当地形成管制,其实际影响远不及白衣神父会。直到 1900 年,公司才在东北罗得西亚有实驻行政长官,但行政长官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衣神父会配合协助。在这一过程中,白衣神父会坚持恭顺从事,在传教站运转以及诸多相关事务上时时报告,处处请示,以当局许可为其圭臬。

首先是土地问题。白衣神父会希望合法而有效地占有土地。在 1899 年的一份针对传教组织申请在黑人村庄地区建立教堂和学校的通告中,东北罗得西亚行政当局规定所有未经行政当局批准转让的土地均属黑人,未经相应黑人族群和英王陛下政府同意,任何土地不得转让。② 而在上述 1899年东北罗得西亚副行政长官给杜邦主教的信中,当局仅同意传教站可管理传教站本身及周边不大于

 $[\]odot$ The letter from Deputy Administrator of North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September 18 , 1899 , FENZA Archives , ZWF – C – 1899/29.

² A circular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Eastern Rhodesia , 1899 , FENZA Archives , ZWF - C - 1899/28.

10 平方英里地区的事务,并未论及土地权属。为此,杜邦主教力求通过规定程序获得土地所有权。 1906 年,当局的土地测量办公室(Chief Surveyor's Office) 致信主教,准予白衣神父会购买奇卢巴拉、卡亚姆比、奇隆加三处传教站所在的相应土地,并发放土地证明。当局免除了白衣神父会的土地购买费用,但收取了赋有管辖权和法定认可意义的测量费、土地证工本费、登记费和印花税,三处土地的测量费分别为 32 镑 12 先令 6 便士、39 镑 11 先令 7 便士、26 镑 16 先令,土地证工本费各 1 镑,登记费各 1 镑 2 先令 6 便士,印花税各 4 镑。 通过这种正式的程序认定,三处传教站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存在。

其次是传教站运转过程中涉及殖民地管理的一些问题。传教站日常与黑人发生关系的场合较多,有些关系看似简单,但涉及的本质性问题却比较复杂。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持枪问题。传教站当时位于蛮荒的丛林中,或为驱赶野兽,或为狩猎,或为在黑人袭击时用以自卫,传教站都会配备枪支和一定量弹药。一般情况下,像使用枪支驱赶野兽和狩猎这样的工作会交给黑人去做。但对殖民当局来说,不管何种理由,将枪支交给黑人都潜藏风险。为此,当局针对传教站持枪做了很多规定。传教站需向当局申请在一定期限内有效的许可证,到期需更新。1906年1月6日,杜邦主教致信当局请求更新持枪许可证。②当局于2月5日复信同意更新,并明确规定:枪支可由一名男性持有,用于射猎鸟类和驱赶野兽;前膛枪许可证费用为4先令,后膛枪为10先令,射猎较大型野兽须有另外的许可证并支付2英镑;枪支许可证由狩猎者在狩猎时携带,此狩猎者须为在狩猎期间隶属于传教站者。③具体到黑人接触枪支,当局规定,枪支许可证只授予主教本人,但主教可指派一名黑人男性持枪狩猎,每次可以是不同的黑人男性,但每次只能有一名黑人男性,且须随身携带许可证。④对于这些规定,白衣神父会都严格遵守,特别是在许可授权方面,白衣神父会处处都表现出对当局的服从。

对身处英国殖民地的具有法国和天主教背景的白衣神父会来说,一方面,它不能承担得罪英属殖民当局的后果;另一方面,它在面临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急情况时,也只能指望英属殖民当局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对当局服从,可以说是一个首要准则。

除了服从当局的管理外,白衣神父会还尽可能配合当局的工作。

对人力、资金等受限制的殖民当局来说,拥有传教站网点和较好黑人群众基础的教会一直是殖民地管理和运转的重要补充力量,它们可以非常好地发挥羁縻黑人、解释政策、推行政令的作用; 而对教会来说,协助当局开展工作既有利于获得当局的认可和好感,也有利于扩展自己的影响。

北罗得西亚的行政中心最初设在今赞比亚东南部的詹姆森堡(Fort Jameson,今赞比亚东部省首府奇帕塔,Chipata),后来移往更偏南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e,位于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接界处)。受人员、资金限制,当局长期无法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实施充分管理,而这些地区恰恰是白衣神父会的基地和主要活动地。因此,当局在这些地区开展的一些工作,得到了白衣神父会的大力配合。

1905年,在卢阿普拉河地带发生了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疫情,对殖民地北部、东北部乃至东部形成威胁。由于这一地区靠近"铜带区"(copperbelt)。铜矿业劳工需求造成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从而给疫情控制带来极大困难。而除了向"铜带区"输送劳工外,这一地区还有一部分劳工南下进入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今津巴布韦)乃至南非。因此,如果不对人口流动进

① The letter from Chief Surveyor's Office to Bishop Dupont , May 1906 , FENZA Archives , ZWF – C – 1906/04.

² The letter from Bishop Dupont to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 January 6 , 1906 , ZWF - C - 1906/01.

³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February 5 , 1906 , ZWF - C - 1906/02.

[⊕] The letter from the Civil Commissione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March 6, 1906, ZWF - C - 1906/03.

⑤ 指跨今赞比亚北部和今刚果(金)南部的铜矿蕴藏地区。

行控制,其后果将非常严重。1907 年,北罗得西亚与安哥拉、加丹加(Katanga) 和德属东非②间的边界被关闭。随后,当局宣布从卢阿普拉(Luapula)和姆维卢湖(Lake Mweru)一带至北罗得西亚和加丹加、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接界一带的地区为疫区,疫区人口不得向外流动;而临近疫区的周边也被划为"警示区"(guard area),"警示区"黑人必须持通行证方可流动。除限制黑人流动外,一些黑人村庄被要求清空,而黑人往常的经济活动或受限制或被禁止,连黑人在卢阿普拉河上捕鱼的独木舟也在应摧毁之列。③这些工作的开展,一方面需要大量人手和资金,另一方面也面临黑人的不配合,令当局难以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白衣神父会及时站了出来。1907 年 3 月,杜邦主教致信当局行政长官,表示愿意协助开展昏睡病疫情应对工作,在当局指导和指示下,在进行力所能及的疫病治防工作的同时尽可能控制可管辖区域内的黑人流动。④ 4 月,当局回信表示感谢,并告知已发布临时禁令,禁止东北罗得西亚地区的黑人居民进入刚果,要求传教站协助宣讲和执行。⑤ 12 月,行政长官秘书致信奇卢巴拉传教站,告知在卢阿普拉河东岸、姆维鲁湖和坦噶尼喀湖南岸等地也发现了昏睡病病例,已发布禁令禁止黑人进入或离开这一区域,要求传教站协助执行。⑥ 此后,当局持续向白衣神父会相关传教站通报疫情控制特别是疫区变动情况,并要求协助做好工作。⑦ 在整个防控疫情过程中,具体工作大部分由白衣神父会开展,当局主要是通报信息和下达指示。应该说,以当时当局所掌握的资源能力,如没有白衣神父会的协助,疫情控制将很难取得实效。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罗得西亚在东部和东北部与德属东非有漫长边界线,而白衣神父会在德属东非也有传教站。随着东非战事的展开,德属东非的德军将军保罗·冯·勒托—福尔贝克(Paul von Lettow – Vorbeck)在包含德属东非、北罗得西亚东部和东北部、比属刚果、葡属莫桑比克、德属卢旺达和布隆迪在内的大范围地区内转战,多次在德属东非和北罗得西亚之间穿插。与此同时,法国也一度存在"维希政府"。这使白衣神父会在北罗得西亚的地位变得复杂微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英属北罗得西亚当局表示忠诚成为白衣神父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随着战事推进,白衣神父会在北罗得西亚的活动区域很快成为战场,德军、英军以及接受英方节制的南非军队在这一地带活动。由于有德属东非的白衣神父会人员进入北罗得西亚传教站及白衣神父会在北罗得西亚的人员中有与德国存在关联者,北罗得西亚当局和英军军方一度与白衣神父会发生误解和纠纷。深知形势复杂的白衣神父会竭诚为当局和英军提供帮助,包括将传教站提供给军队驻扎并提供一定给养、在战地医院治疗和护理伤病人员、协助当局和军队招募黑人提供军事劳务等。1915 年4月,利文斯顿行政长官秘书致信驻卡萨玛(Kasama,今赞比亚北方省首府)地方长官,要求后者向白衣神父会的拉吕主教(Bishop Larue)转达谢意,因为其将卡亚姆比传教站提供给军队使用,并安排传教站人员在战地医院服务。1917年2月,当局致信拉吕主教称,"在贵传教站所在区域的当局官员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和良好配合,你们为军方提供了很多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对此表示感谢",而当局和军方之使用黑人劳工,"你们的影响力和培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⑧

① 位于"铜带区",属今刚果(金)。

② 亦称"坦噶尼喀", 今坦桑尼亚大陆部分。

³ Charles Perrings, Black Mineworkers in Central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Pub. Co., 1979, pp. 15 – 17.

⁽⁴⁾ The letter from Bishop Dupont to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 March 24 , 1907 , ZWF - C - 07. 09/02.

⁽⁵⁾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April 30 , 1907 , ZWF - C - 07. 09/03.

 $[\]textcircled{6}$ Th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s 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December 3 , 1907 , ZWF – C – 07. 09 /04.

 $[\]bigcirc$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September 23 , 1908 , ZWF – C – 07. 09/07;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October 6 , 1908 , ZWF – C – 07. 09/10; The letter from the Native Commissioner to Bishop Dupont , December 6 , 1908 , ZWF – C – 07. 09/11.

 $[\]textcircled{8}$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s office to Bishop Larue , February 1 , 1917 , ZWF – C – 17/01.

三、白衣神父会和当局之间的职权争夺

尽管白衣神父会强调对当局服从并注重配合当局工作,但二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在传教站可辖范围内黑人的一些事务问题上,白衣神父会和当局之间多次发生处置和管理权的争夺,特别是在殖民统治建立初期。

首先,在对黑人司法权的问题上,白衣神父会和当局一度出现争持。

传教团体在北罗得西亚传教初期,面对一时"难以教化"的黑人,有时会有强制举措,比如鞭打损坏或者盗窃传教站财产的黑人、对"不守规矩"的黑人罚役罚物等;另一方面,一些传教站周边的黑人在处理某些事务时,又往往会主动求助于传教站,特别是在出现争端时,传教士往往会被请求进行仲裁。

由于长期在奔巴地区活动,并与姆旺巴酋长之间有特殊渊源,杜邦主教深受当地黑人信任和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视其为酋长——这也正是杜邦主教在姆旺巴死后一段时间内一度声称的。在 1899 年给白衣神父会的建立传教站的许可信中,当局同意传教站 "可掌管传教站本身及周边不大于 10 平方英里地区的事务,可管理所辖范围内黑人居民的司法事务,可任命两名黑人协助管理事务"。这既是因为当局当时无法实施实际管控,也是由于杜邦主教及其白衣神父会确实有相应的权威和能力。尽管当局明确地在具体管理范围、协助管理事务的黑人的任命、处罚犯错或违规黑人等方面做出了限制,但在当时条件下,许可和限制之间的界限实难把握,限制则更难实际实施。

杜邦主教主事期间,北罗得西亚当局驻卡萨玛——白衣神父会的主要传教站集中于此——的地方官一度无法在当地征税,因为黑人们认为税款只能交给杜邦主教。① 而与此同时,当发生纠纷或者罪案时,黑人也总是向杜邦主教申诉。这两点使当局颇为不满,但当时只能表示抗议和提出警告。1911 年,北罗得西亚当局明确宣示杜邦主教不应声称拥有或实际行使酋长权,1899 年许可信所及为当时权宜,现已失效,酋长权只能由黑人持有。② 杜邦主教于 1912 年离开北罗得西亚,这使当局从白衣神父会手中收权更加便利。1914 年 11 月,土著事务部发布关于白衣神父会传教站及传教站周边黑人居民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生活在传教站周边的黑人受黑人酋长控制,仅生活在传教站地产范围内的黑人可由传教站管理。③ 同时,土著事务部执行秘书训示驻卡萨玛地方长官,称1899 年授权杜邦主教管理黑人只是因为当时在那里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和安排行政人员,而现在这些都已具备,因此,"目前的情况是,除了受命的行政官员和土著事务专员外,没有人能对黑人行使司法权"。④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白衣神父会的权威并未受到真正削弱。1917 年,"白衣神父会"的一处传教站试图扩大控制范围,将附近的一处黑人村庄并入。在相关地方行政长官拒绝这一请求后,白衣神父会一度咄咄逼人,对地方长官提出质疑,表示黑人在处理某些事务时寻求传教站介入乃是自愿,批评地方长官干涉传教站对"信徒"的管理。⑤ 地方长官针锋相对,明确表示在黑人司法问题上,小的事务由当地黑人酋长处理,大的事务则需交给当局设在当地的法庭;对于黑人倾向于寻求传教站解决某些纠纷,地方长官认为这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走过多的路,但无论如何,司法权归属当局或由当局决定归属无可置疑;而至于说到当局干涉传教站事务,地方行政长官指出根本原因在于传教站管得太宽,并明确表示,固然有一些黑人乐于与传教站来往,但同样也有一些黑人并不愿接

① Marja Hinfelaar, "Remembering Bishop Joseph Dupont (1850 – 1930) in Present – Day Zambia,"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 33, No. 3 (2003), p. 368.

² Marja Hinfelaar, "Remembering Bishop Joseph Dupont (1850 – 1930) in Present – Day Zambia ," pp. 368 – 369.

³ The letter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for Native Affairs to the Magistrate of Kasama , November 3 , 1914 , ZWF - C - 10. 14/16.

 $[\]textcircled{4}$ The letter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for Native Affairs to the Magistrate of Kasama , November 3 , 1914 , ZWF - C - 10. 14/17.

⁽⁵⁾ The letter from Bishop Larue to the Magistrate of Kwambwa , May 7 , 1917 , ZWF - C - 1917/06.

受传教站的辖制,当传教站要求当局本着良心对待"信徒"时,当局同样也要求传教站本着良心对待"非信徒"。^①

其次,白衣神父会还在一些民事管理问题上与当局出现分歧,比较典型的是黑人婚姻问题。

根据当局规定,黑人的婚姻依据黑人习惯法缔结,但也可依据 1903 年当局发布的《东北罗得西亚婚姻规定》(North - Eastern Rhodesia Marriages Regulations)缔结,依此规定缔结婚姻须登记、宣誓和取得证件。②但是,在白衣神父会传教站范围内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传教站为一些黑人结婚举行天主教仪式,包括为已婚者补行仪式,还存在已按当局法规缔结婚姻者被补行仪式的情况。在当局看来,白衣神父会以宗教仪式给予婚姻或明示或暗示的认定将混淆黑人对于权威和合法性的认识。因此,当局向白衣神父会宣布:不反对为黑人举行仪式,但仪式仅具有宗教性意义,不具备法律效力,任何赋予宗教性结婚仪式以法律效力的行为皆为非法。③

但在实际过程中,当局并没有调查和管控的资源和能力,按白衣神父会宗教仪式结婚并以此为准的黑人仍然存在。白衣神父会也将此看作传教的成效表现之一,极力维持和寻求扩散此种模式。1916-1917 年间,一名属于白衣神父会传教站控制范围内的黑人妇女按当局法规与一名黑人男性缔结了婚姻,这激怒了白衣神父会。白衣神父会致信称当局按法规承认此婚姻是对传教站的无视。并在相关村庄里向黑人宣传此桩婚姻实为"姘居",要求众黑人村民谴责和抵制此名妇女,使这名妇女受到极大困扰,以致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罗马天主教的怀抱"。每对此,当局召集婚姻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所在村庄酋长和地方官开会,明确告知白衣神父会"按本领地的法律",二人的婚姻合法,要求"白衣神父会"立即终止在相应村庄发起的针对当事黑人妇女的抵制。由于这一事件,当局于1918 年通过法令,首先表示承认宗教仪式的重要地位,宗教人员为黑人行相关仪式以凸显其神圣性无可非议。但是,并非所有人员都可以承担此任务。当局要求各传教会提名人员,然后由当局认可发证,只有这样的"认证牧师"才有资格为黑人婚姻举行宗教仪式。①

除了以何种方式认定黑人婚姻为有效这一问题外,白衣神父会还因为黑人一夫多妻的问题与当局发生争执。在北罗得西亚黑人社会里,一夫多妻广泛存在,这不仅被黑人习惯法承认,还颇受推崇。而按白衣神父会的标准,这不可接受,它把废除黑人一夫多妻作为传教的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局也并不认可黑人一夫多妻,但它仍承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当局统治便利和管理成本等角度来考虑,没有必要去强制改变。在此情况下,白衣神父会认为,既然这二者都无所作为,那么白衣神父会就应该担起责任。但是,当局认为,即便当局不予干涉,也轮不到白衣神父会行使职责。而且白衣神父会反对和强制消除黑人一夫多妻的行动可能引发黑人反弹,而黑人反弹势必又会给当局造成困扰。为此,白衣神父会与当局间争执不断。

总体上来说,白衣神父会与当局之间的职权争夺最终都以白衣神父会妥协或者失败告终,但当局也不可能把事做绝,它仍然愿意尊重、承认并努力发挥白衣神父会在笼络黑人民众、维持统治、协助行政、传播文化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白衣神父会与当局之间在社会发展事务方面的矛盾

尽管白衣神父会在与当局的职权争夺中无法取胜,但在社会发展事务方面,白衣神父会却始终

① The letter from the Magistrate of Kwambwa to Bishop Larue , May 16 , 1917 , ZWF-C-1917/07.

² Memorandum as to the Law Concerning Marriage between Natives in Northern Rhodesia , January , 1917 , ZWF - C - 1917/02.

³ Memorandum as to the Law Concerning Marriage between Natives in Northern Rhodesia , January , 1917 , ZWF - C - 1917/02.

[⊕] The letter from Father Ross to the Native Commissioner of Mporokoso, July 27, 1917, ZWF – C – 1917/13.

⁽⁵⁾ The letter from the Native Commissioner of Mporokoso to Father Ross , August 10 , 1917 , ZWF - C - 1917/14.

The letter from the Native Commissioner of Mporokoso to Father Ross, August 10, 1917, ZWF - C - 1917/14.

The letter from the Magistrate of Kasama to Bishop Larue , April 25 , 1918 , ZWF - C - 1918/10.

能凸显自己的存在。

在向黑人提供教育的问题上,白衣神父会与当局有可达成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分歧。对白衣神父会来说,其传教事业离不开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当地黑人。对当局来说,接受一定白人教育的黑人既有利于当前的管理,也有利于未来的同化。但是,"一批"应该是多少。"一定文化程度"到底是什么程度却殊难把握。当局很清楚,黑人掌握白人的东西越多,就越有可能也越有能力反对白人。而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中南部非洲,黑白种族的分野是始终要维护的,向黑人提供教育恰是对这种分野的一种威胁。当局也很明了教育之与传教会的关系。就非洲的情况来说,传教即教育,教育即传教,传教站就是学校,学校的扩展就意味着教会的扩展。因此,当局还要考虑教会势力的扩张可能。

白衣神父会自进入北罗得西亚之日起,就开始向黑人提供教育,逐步设立了附属于各传教站的多所学校。随着力量增强,一些传教站开始收纳寄宿生,他们一方面是学生,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传教站的劳动力。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一小批能较好地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的黑人,出现了一批教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这两方面都是当局极为关注并有所警惕的。随着行政资源和能力的增强,当局开始对传教会设立和运营学校进行管控。

1914 年,白衣神父会致信北罗得西亚行政长官,提出在卡萨玛设立一所"更高级的学校"。①对此,当局回应称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白衣神父会"已经有如此多的学校",短期内似不可能再建一所这样的学校。同时,当局也就教育如何实施提出看法 "目前的教育应致力于让黑人明白英国的力量和成功的必然性,消除他们心中的不安和疑虑,以免造成混乱。"② 1915 年 6 月,当局致信拉吕主教,随信附带一份来自南罗得西亚的关于实施土著教育的指导材料。材料比较细致地陈述了如何实施黑人教育,涉及年级构成、数学教育、英语教育、技艺教育、卫生教育诸方面。要求针对黑人总体只设三个年级、数学主要是识数和十以内加减法、英语主要教口语、技艺和卫生教育贯穿始终,总的目标是使黑人更为勤劳、能干,且能具备可与白人共处的基本仪表和健康。③

随着传教事业扩张和人手短缺,一些传教会设立在黑人村庄的学校开始出现实际上由黑人管理的情况。对此,当局明确提出要进行管控,要求在黑人村庄建立学校和委任相应教师须满足如下条件:设立学校要由相关村庄及其头人通过当地的土著事务官员向相应的地方长官提出申请,后者同意后方可设立;黑人村庄学校的选址最终由土著事务官员认定;如委任黑人教师,则须先将此黑人教师提名至土著事务官员前,由其认定是否合适后再向相应的地方长官推荐,后者认可后方可委任;没有地方长官的书面同意,任何黑人教师均不能成为学校掌管人;黑人教师没有所在村庄头人同意不得耕种学校周围土地;土著事务官员如认为黑人教师言行不当,有权将情况汇报给地方长官,由地方长官裁置。④

在当局看来,向黑人提供教育是可以的,但一旦黑人受教育达到一定程度甚至能够成为教育者时,就需要实施限制了。对于传教会主持的教育事业,当局总体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为了更便于统治和管理,保持大部分黑人无文化和一小批黑人低文化仍然是必要的,黑人获得文化和提高文化水平的速度要控制,涉及黑人的面也要限制。

在维护黑人权利的问题上,"白衣神父会"始终以黑人权利代言人自居,常常成为当局的"异见者"。

殖民时代中南部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矿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的、持续的劳工需求,而

 $[\]textcircled{1} \quad \text{The letter from Bishop Larue to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ern Rhodesia , December 23 , 1914 , ZWF-C-10.14/18.}$

②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ern Rhodesia to Bishop Larue , February 9 , 1915 , ZWF - C - 15. 16/01.

³ Notes on Native Code , attached with th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for Native Affairs to Bishop Larue , June 10 , 1915 , ZWF - C - 15.16/03.

[⊕] Th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for Native Affairs to the Magistrate of Awamba, September 19, 1917, ZWF - C - 1917/23.

北罗得西亚的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当时正是主要劳动力储备地之一。1909-1910 年间,北罗得西亚东北部地区发生饥荒,白衣神父会认为这与当局主导的劳工征发有直接关联,遂致信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当前的饥荒,请求当局提供关于劳工征发和流动的具体情况说明,提请当局注意在劳工征发过程中发生的不人道问题和劳工的基本权利问题。①

对此,当局回复称: 首先,饥荒确实有劳工外出的原因,但干旱也是重要因素; 其次,关于黑人离乡情况,第一类是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矿山打工者,第二类是担任领地警察和士兵者,这两类此前就已存在,因而并非当前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类是在临近的东卢安瓜地区(East Luangwa)的棉花种植园打工者,都是 4-5 个月的短期工,当局已要求尽可能限制; 再次,关于劳动征发中的不人道问题,主要是在劳工体检过程中发生,黑人不愿意接受体检,当局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关于征发劳工送往矿山,当局明确支持,因为这可以教会黑人服从和纪律,也可以使他们将钱带回农村。同时,当局会考虑开展工作以更好地对待黑人; 第五,关于是否人道的问题,当局表示"承认主教在这方面的见识和经验,希望后者能在以后的相关工作中提供协助"。②

可以说,在向黑人提供教育和维护黑人权利这两个方面,白衣神父会始终 "柔和地"坚持,让 当局不得不考虑其诉求,至少在表面上做出姿态。

结语

白衣神父会扎根于赞比亚的东北部和东部,这片区域相对北部的铜矿地区而言较为落后,相对 西部和南部较早与殖民者打交道的地区而言则显得较为闭塞,但正是这种环境使得白衣神父会的传 教以及与传教相伴随的教育、社会事务参与等活动的效应更加突出,传教站影响所及范围内的居民 易对白衣神父会产生认同,信众的忠诚度也较高。

除白衣神父会外,伦敦传教会、巴黎传教会、原始循道会、荷兰归正教会等也在北罗得西亚立足,它们在赞比亚殖民时代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尽管它们的地位随着殖民当局体系和能力的逐步完善而有所降低,但其影响已不可抹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传教会构筑了各自的一方天地、塑造了一批追随者、获得了对一些事务的介入权或至少是发言权。1964年,独立的赞比亚诞生,黑人当局并未对殖民主义存在进行过激的改变,而教会力量更因其特殊性而受到尊重,它们遂汇集成一股虽内有歧异但却在总体上一致且非常强大的力量。

教会力量对政府当局,既有服从配合,也有明争暗斗。政教关系有时和谐平衡,有时则冲突失衡,在这种复杂互动中,政府当局的能力是一个关键。在殖民时代早期,北罗得西亚当局迫于物力人力不足,一度依赖传教会协助施政,而随着殖民当局机构和人员的逐步充实以及管理的逐步完善,传教会的活动空间就开始缩小,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受政府的限制和打压,但它们仍能发挥重要作用,凸显自己的存在。相对于殖民时代的政府而言,独立后赞比亚黑人政府在政务的管理、执行和监督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这既在客观上要求教会力量在一些领域存在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使教会产生当仁不让的心态。在此背景下,赞比亚的教会力量努力固守自身在宗教传播、教育和社会发展事业、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等方面的传统阵地,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它们又开始介入 "民主"、"人权"等事务,一跃而成为赞比亚政府的批评建议者、监督者乃至某些事务的直接参与者。

与殖民时代政教关系发展的历史相对照,赞比亚独立后的政教关系变迁总体上仍然是遵循"既有服从配合,也有明争暗斗"的模式。但独立后赞比亚政府的施政能力一直都较为薄弱,虽然教会力量对赞比亚政府的"服从配合"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明争暗斗"也在日益扩展。面对历

① The letter from Bishop Dupont to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 January 27 , 1910 , ZWF - C - 10. 14/04.

² The letter from the Administrator of North - Eastern Rhodesia to Bishop Dupont , February 21 , 1910 , ZWF - C - 10. 14/05.

史根基牢固、群众基础深厚、思想观念影响力强的教会力量,赞比亚政府既无法抛开,又无力有效 管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失衡。

责任编辑:宋 鸥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Zambia

LIU Wei - cai

(African Studies Cente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Zambia began to be more complex since around 1990s, the church had more and more power and influence, whereas the state had to retreat in some fields. To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well, we need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White Fathers is an important church in Zambia, which had involved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orthern Rhodesia and thus had a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advantage in mass base and influence of ideology, the White Fathers submitted itself to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Northern Rhodesia and also struggle for its own power and influence.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has sustained and developed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Zambia. When the authority reveals some weaknes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gradually increased, this is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Zamb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White Fathers; Northern Rhodesia

(上接第76页)

On the Rise of the Science of Legal History in Modern England

YU Hong

(Department of World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legal history works. Edward Coke , John Selden and Matthew Hale were the foregoers in this field. They expounde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common law , and safeguarded its independent status. By succeed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n mentioned above , Maine introduced the positivism method into the study of the legal history. Maine also emphasized that it need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law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Furthermore , Maine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d both the methods of the School of Natural Law and the School of Analytical Law. Maitland researched a huge number of plea – rolls and parliament rolls and analyzed carefull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nglish law. His efforts gave the English legal history study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historiography , and made sure the science of legal history an independent status in the field of law study.

Key words: historism; positivism; the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the science of legal history